

執拗的低音

◎王汎森

二〇一一年三月，我應復旦大學之邀，擔任光華講座，進行四場演講。當初即言明講座的成果要集結成一本書。我最初的計畫是在講完之後，好整以暇，慢慢地將四篇文章寫出；然而演講之後，我雖曾寫過幾章，但是也有一部分只能退而求其次修改錄音稿。所幸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錢雲程程度很高，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個講座的主題，事實上是我在接受復旦大學邀請時突然跳出腦海的。我當時覺得手中正在做的幾個研究，及一些對史學研究的視野及方法論的關懷，似乎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即「執拗的低音」。

何謂「低音」？由於這個書名是後起的，所以我採取的是非常寬鬆的定義。最初的設想只是想重訪近百年來被新派論述所壓抑下去的聲音，但是後來我決定將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維方式、觀念等也包含進來討論。本文所說的「低音」大致是四個層面：一是省視被近代學術及思潮一層又一層複寫、掩蔽、遮蓋、邊緣化，或屬於潛流的質素。二是對歷史研究而言，「創造性轉化」與「消耗性轉換」的同一性，以及它對歷史研究造成「意義倒置謬誤」的現象。它還包括一些無所不在的學術框架，一些無所不在的假設——假設西方是普遍的，中國的歷史是個案的。三是方法或視野上面的問題，譬如後見之明之類的思維如何影響我們的史學。四是一些長期以來被認為具有永恆性，在近代卻被長期忽略的主題。

這一個世紀以來，關於新舊思想的爭論，大部分都把「史實的重建」和「價值的判斷」混在一起。新派人物因為鄙棄保守派人物的思想，對他們的學術觀點也一概否定。保守派人物也常常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對於一個歷史學者而言，這兩者都不是健康的態度，值得重訪。當然這兩者之中，又以前者為情形更為嚴重。這一百年來，新派逐漸成為主流論述，舊派對於歷史文化的看法卻因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連帶地掃到歷史的邊緣，成為被否定，或隱蔽的層面。

在這裡我要強調幾件事。第一、我個人的研究主題之一便是中國近代的新學術，我深深相信近代學問的進步，仍然以新學術之建立為主。譬如用西方嚴格的語言學知識對中國傳統的語言音韻學做出的創新，或如胡適（1891-1962）所說：「治國學必須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都是非常好的例子。第二、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這次演講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在追求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所有用得上的資源都是有益的，不管中西，也不管新舊。第三、我認為在近代思想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一些學術上的偏蔽之處，是到了應該「重訪」的時候。現在將這些問題解放開來，重新加以省視，是一個有益的方向，進而改變過去趨於兩個極端的舊視野。採取開放的態度，也有可能獲得新的現實資源。第四、不瞭解「低音」，就不能真正瞭解「主調」，而且「低音」常常是可以輔助「主調」的。

新學的震盪其實是幫助人們「重訪」歷史。比如經過古史辨運動之後，出現了「疑古」、「釋古」、「考古」三派。如果沒有經過激烈的疑古，恐怕「釋古」、「考古」都不可能出現，不會注意到要先把先秦史書中的記載提起來抖一抖，再放下來重估其價值。沒有經過一番震盪，不可能平情地「釋古」、「考古」。現在很多人又毫不別擇地走回到「信古」，那也不是我的態度。舊派有可能因為太受仁義道德或「聖道王功」的影響而被嚴重地

遮蔽，也可能處處為了把中國歷史傳統說成與西方相異，而掉入另一個陷阱，或是為了表示西方近代所有的，中國古亦有之，而反模仿了西方的近代，形成另一種扭曲。我的意見是要「重訪」，但不是要不經研究地復古，而是重新瞭解它的「正形」（套用傅斯年〔1896-1950〕在《赤符論》未刊稿中的話）——雖然這是不容易達到的。我的理解是人們往往要經過幾度類似現象學的還原工作之後，才能重新去掌握歷史文化的「正形」。

我之所以想要談「執拗的低音」，一方面是希望能檢視被近代激烈思想壓下去，或覆寫，或不斷擦拭之後殘留的文本，或是被暫時淹沒的觀念，同時也意識到，要檢討近代保守派的論述。事實上許多人因為反對新文化，而弔詭地「反模仿」西方，也就是說認為凡與西方或新文化相反的那一面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本質，但事實上是與西方或新文化對反的思維來定義傳統。所以我想像中的「重訪」當然也包括這一面。

因此本書中所宣揚的是陳寅恪所說的「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為了做到這一點，本書所提倡的是「加法」，而不是「減法」，更不是退縮法——我不是要退縮回近代以前的舊論述，而是要在新史學所奠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求索。所以既不是「第一種」（趨新），也不是「第二種」（守舊），而是改變視野成為「第三種」。換句話說，正賴有近代的各種新學術的成績，我們現代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重訪」。要真正把握「低音」，不是靠退縮回到過去，而是需要用世界上所有用得上的學問才可能撥雲霧而見青天。

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時間序列」的問題變得非常重要，而它包括了許多方面。第一、我注意到創造轉化本身的消耗很大。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會發現有些東西沒有被表述和彰顯，有些東西慢慢成為低音。例如梁啟超（1873-1929）說：「學案者，學史也」，這個說法當時風靡一時，被認為是對學案的新看法。可是現在回頭去看，梁啟超把生命的哲學轉化為學術史後，其實把宋明理學中觀照生命的部分去掉了，很多東西都看不見了，只是在那裡尋求抽象的理論，這就是一種「消耗性的轉換」。

第二、「後見之明」作為一種歷史思考方式時所遇到的困難：還有我們歷史解釋中往往會設想歷史人物是處在「無限理性」的狀態下；提到我們該如何重新瞭解「風」，以及這種史學思維可能為歷史研究帶來何種的新養分；又如在新史學中，「歷史」與「意義」如何分道揚鑣；以及它為何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老問題。

第三、歷史中的行為、事物之間的關係，很難用我們目前的詞彙與概念完整描述。譬如歷史上兩種文化交遇時的關係，常如兩種不同顏色流質的互相暈染，可是現在好像沒有足夠的詞彙可以狀寫。古代的歷史、文化也是一樣，其中有許多複雜的情狀，恐怕不是我們現代的學術語言所能充分表述。更何況，我們所使用的許多學術語言是從日本或西洋次第借來的新詞彙或新觀念。這一百多年來，我們對知識的瞭解、定義、詮釋、範圍，大多是跟著新式教科書走的，就像突然一陣風吹來，人們的思維世界悄悄轉換成教科書或其他新書中的新定義、新概念，此後大家相沿而不自知，幾乎不再意識到其中有一個很複雜的歷史過程。

第四、我們的思維世界受到近代西方思潮的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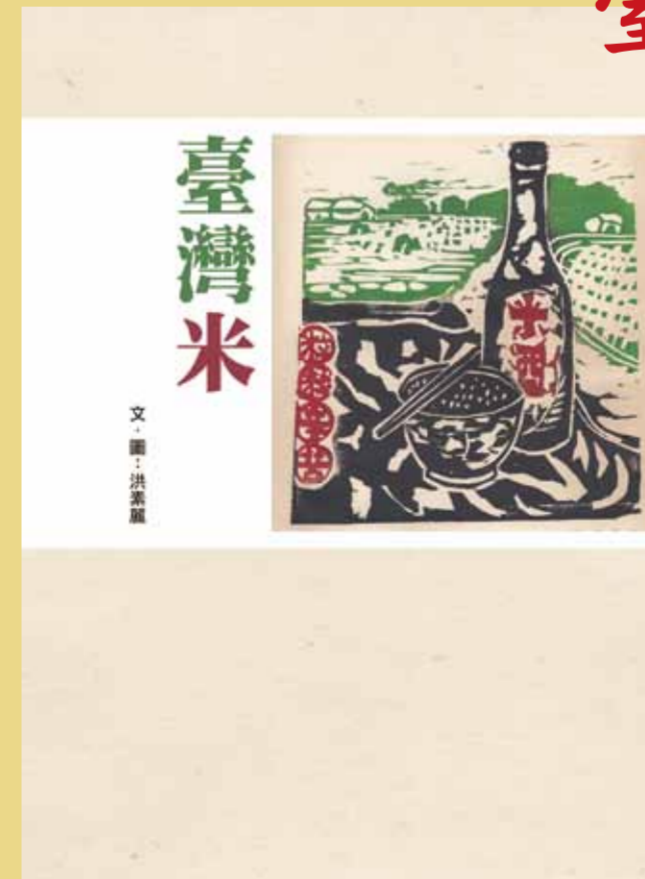
禮後，經歷了如大海潮般的變化，使得我們看待事物及資源之態度，有了一種深刻的轉變，譬如線性進化歷史觀的影響。在這些新的思維框架下，往往認為只有最當前的、最科學的、最進化的，才是最正確而有價值的。

第五、主流論述研究的重要性當然不在話下，但我認為現在的我們也應該要注意到主流之外有第二、第三層次的潛流。我們觀察一片林相時，也必須注意大樹下面樹根的活動。主流與非主流的種種層次常同時疊壓在一起，形成競爭狀態，這裡面還有很複雜、很精微的相互依存關係。主流上升為主流的過程，往往有幾個層次的競合關係。因為我們習慣只見到主流，沒能用主流所能接受的語言來描述其他複雜的存在。我們對長在地上的樹很瞭解，兩棵樹可以看來毫不相關，可是我們忘了下面的樹根可能糾纏在一起了。

重訪執拗的低音，也是在尋找多元的資源。「資源」是資源庫中的東西、是供選用的，而不一定就是一個確切的答案。就像我們住飯店，不必從一號房間開始住，下次住二號，再下次住三號。有用的資源，不是一個一個前後排除般的發生關係，而是開放性的，充分承認歷史工作對古今思想資源的開發及思想資源的意義，而不是認定只有排在最當前的這一個才有現實意義，或是只有被打扮成與排在最當前的這一個一模一樣的歷史與思想，才具有現實意義。那麼歷史或思想史的工作將會豐富我們現實生活的資源。若我們想瞭解古代人物的

南方的榕樹， 臺灣的稻米

◎洪素麗



百民主臺灣的生命寫照。「南榕廣場」的命名，是一則美麗的本土寓言再現。火鳳凰烈燄燃燒後，聖潔靈魂的完成。臺灣人生存悲願的落地生根。

這本詩集獻給對本土臺灣懷抱悲情與願景的人。臺灣人手植稻米，粒粒辛苦。臺灣人在美麗島嶼上，建設獨特的海洋文化。臺灣文化是包容心寬廣的，耐苦，美善，靈秀，而又勇敢堅忍。臺灣文化融合了原住民文化，中國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以及短暫落足過臺灣的歐洲文化。生機蓬勃，是臺灣文化的特色。而「稻米」是臺灣農業文化的主题。「臺灣米」是臺灣土地上源源不絕的詩的泉源。

此詩集是近三年二〇一一—二〇一三的作品。加上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年間部分舊作。馬軻蘭先生費心英譯了44首。他在忙於翻譯《鍾理和文集》中，撥冗英譯我的詩，永遠感激不盡，尤其故友鍾鐵民，是介紹牽成者，鐵民早走一步，思之心傷。

承蒙吳東昇賢伉儷的支持與愛顧，以及好友廖志峰對文學的堅持；《臺灣米》得以在允晨文化出版。作者致上最深的謝意。

詩集《臺灣米》付梓之際，正值臺南成功大學學生為「南榕廣場」的命名，和校方官方拉鋸之時。校方官方一貫執著國民黨殖民主義的心態，歧視臺灣，滅絕臺灣文化不遺餘力。手段粗糙，心態幼稚。

南方的榕樹，枝葉茂盛，美好巨大的生命樹，正是鄭南榕以自己生命，無私奉獻百分之

懷想20世紀80年代

◎韓秀

寫在《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出版之前（上）



我將要跨過台灣海峽，到北京去。痲弦先生說，給我們寫稿，跟大陸的老作家們建立起聯繫，方便的時候請他們也給我們寫稿……北京的肅殺與台北的溫暖正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台灣真正成為我的文化原鄉

20世紀八〇年代，由華盛頓而台北、北京、曼哈頓，又回到華盛頓。在這十年裡開始了我自己的華文文學創作生涯。在台北兩岸沒有通暢管道的當年，憑藉著我們在北京的美國外交官身分，依靠美國政府所提供的郵路之便，為台北學人收集到一些研究資料；與大陸老作家建立起親密的聯繫，為台北聯合報系爭取到這些著名作家的新稿，建立起台灣兩岸學術方面、文學出版方面的一些往還。其中最關鍵的便是台北的一年。沒有這一年，一切都無從談起。

被外放到華文地區的美國外交官通常都有兩年的語言訓練，第一年在華盛頓的國務院外交學院，第二年在台北陽明山上美國外交學院的一個分校。於是，1982年的夏天，我便跟外子Jeff一道來到了滿街都是正體字的台北，溫暖、熱情的台北。

我們住在陽明山上山仔后住宅區，那裡曾經是美軍眷村。我家與文化大學一牆之隔。有此天時地利之便，在我三十六歲的時候順利得到入學聽講一年的機會。

上課鈴聲還沒有響起，教授三十年代文藝思潮的李超宗教授瀟灑瀟灑走了進來。就此，開始了我與李博士長達十九年的師生友誼。那時，我並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不止是一位大學教授，一位學者，一位作家，他還是一位極有遠見的編者。課餘，李教授帶我來到台北「自由之家」認識了許多

師長。多年以後痲公告訴我，李教授當初曾經跟他說，「這是一個能寫的……」

這一個能寫的，當時卻還只是一個能講故事的名作家，名詩人，名主編們幾乎都是在1949年之前離開大陸來到台灣的，家鄉的一切都是刻骨的惦念。從1948年9月到1978年1月，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我卻是在那塊土地上度過的，更有整整十二年曾經住在鄉村與邊疆。師長們都是寫手，自然也關心大陸文藝界的狀況，我又因為各種機緣對於這個圈子的人物相當的熟悉。一天，有人提到「大陸文壇」這樣四個字。痲弦先生聲音沉穩地正色道，「大陸沒有文壇，只有不能自由創作的寫作者。」〈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成為「文藝方針」，成為緊箍咒，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奄奄一息，作家協會、文聯之類的機構從來不是一個祥和的地場。我猛然想到老舍先生、蕭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市文聯所遭受到的殘暴對待，心情黯然。因為這樣的觸動，在這一年結業的時候，我向學校提出的報告是關於老舍先生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台灣，老舍的小說在一段時間內並不是容易找到的書。1983年6月14日到16日，《聯合報》副刊連載了我的這篇報告〈太平湖畔的孤影〉，這篇文章便是我寫作與出版的起始，到了2013年，正好是三十年，三十年來未曾間斷從世界各地寄稿到台灣，在台灣的報刊雜誌寫專欄，出書。台灣真正成為我的文化原鄉。

離別在即，我將要跨過台灣海峽，到北京去。痲弦先生說，給我們寫稿，跟大陸的老作家們建立起聯繫，方便的時候請他們也給我們寫稿。魏子雲教授說，大陸金學研究現狀如何，方便的話幫忙找一點資料。

北京的肅殺與台北的溫暖正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放下行李馬上到使館報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已經安排我在使館教書，「你是唯一的美籍教師，大家都需要你。你有專屬課室。」人事處官員嚴肅告知。在使館內部的銀行用美金換了一堆「外匯券」，直奔東城史家胡同外家。八十六歲的外婆與Jeff是頭一次見面，竟好像多年不見的親人一般。五年半不見，太多太多在給我們的信裡不能寫的內容，呼啦啦地倒了出來。外婆不說普通話，滿口無錫話，Jeff居然沒有障礙，讓我非常的詫異。

我的課室極其特別，孤零零一間小屋坐落在使館花木扶疏的院落裡。為我開門的是一位海軍陸戰隊的軍官，「你可以將學生的學習資料留在課室裡，我們會嚴密監視，不准任何『外賓服務局』的人接近。我們會清除『小眼睛』、『小耳朵』。這是一項永不間斷的工作，他們裝，我們拆。」他說的每一個字我都牢記在心。

之後的三年，朋友們的通訊處我一直隨身攜帶，絕不留在「家」中。正在寫的長篇《折射》無法帶來帶去，只好暫時擱筆，鎖進了使館的保險

箱。我開始寫短篇小說，十幾張稿紙帶在身邊，完成之後馬上交外交郵袋寄往台北。台北來信全部收在課室的文件櫃裡，與學生們的學習資料一道受到海軍陸戰隊朋友們的悉心照顧。外交官們在繁忙的工作間隙擠出時間來到課室，研讀他們需要了解的課題。我的豐富的中國經驗自然也及時地派上了用場，再一次成為唯一能夠讓美國外交官迅速了解中國國情的中文教師。

西方書本上從未揭示過的現代中國

Jeff也成為當年美國大使館唯一真正能夠接觸到中國老百姓，隨時走進一所民居了解老百姓衣食住行、喜怒哀樂的外交官。從文革苦難到被迫墮胎、戶籍障礙、住房噩夢都在人們的訴說之列，無不涕泗滂沱痛不欲生。Jeff聽到、看到、感覺到了西方的書本上從來沒有揭示過的現代中國。

抵達北京未滿一周，我向中國作家協會發出一封信，請他們轉交吳祖光先生。信被退回來了，是被粗暴地拆過的，用漿糊亂七八糟地貼住，上面歪斜地寫著四個大字，「查無此人」。名滿天下的吳祖光先生，竟然是這樣的待遇。我繼續努力。1983年夏天，我試圖聯絡的師長、朋友一概聯絡不上，撞了一頭包，這才知道我這個北京通的能力也是有限得很。

尷尬的局面在一夕之間打破了。1983年8月22日，大陸國務院僑辦的一位熟人出現了。他表示我可以寫信給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周有光先生，找到周先生，就找到了許多老作家。北京郵局也很「盡責」，周有光先生的回信平安抵達，不僅得到祖光先生的地址電話，甚至得到沈從文先生的通訊地址。我在1983年8月30日寄往徐州師範學院的信在整整兩個月後也有了回音，張遠芬先生是大陸金學研究者之一，於是魏子雲教授的囑託就有了著落。

此人的來訪繼續發酵，甚至，我居然在戒備森嚴的地方「偶遇」中學老同學。

中國社會的撲朔迷離，台海兩岸之間的層層迷霧，我卻是通過老朋友陳文泰弄清楚的。雖然我給他的信也「失落」了，我八歲就認識的這個人卻在茫茫人海中出現了。我們共過患難，我們之間的默契能夠搬山移海。多半的時候，我與文泰在中醫劉義方老大夫那裡見面，在火鍋與小米粥的熱氣裡，歷史一點一滴露出了真實的面目。與此同時，短篇小說〈兩位醫生〉的素材也在不斷地充實。我的小說為他，為他的雙親，為我們大家的朋友劉義方大夫留下了身影，也為一件幾乎埋藏到了無痕跡的近代史中的事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版本。小說的源頭離不開八〇年代我在北京的種種「偶遇」，內中充滿了必然。

真正將新疆的過往完全地拉回到我面前的是張明忠。八〇年代初，他已經從新疆返回。一見面，話匣子打開。從「大牆」外邊一直聊到「大牆」

裡邊，暴土狼煙的戈壁灘、靜默無語的大沙漠、帶著鏽鏽搬砂運土的勞改犯，那許多發生在禁閉室、基建隊、勞改隊的故事。我甚至感覺得到南疆沙漠腹地的酷熱與嚴寒，聞得到沙棗花香。我們的記憶非常清晰，互相補充互相提醒，任何的細節都不曾遺漏。這時候，我才真正意識到，新疆不會遠去，那塊土地與我同在，無論我住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張明忠知道許多老朋友的諸般近況。他們還在暗夜之中。〈長日將盡〉的素材就這樣長久而清晰地被保留了下來。八〇年代，他仍然背負著沉重的檔案袋。記錄著他多次提出了保護自然生態的大課題，與當年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為此被扣上反革命帽子，被關押、被批鬥。平反回城，各單位都知道他滿腦袋反骨，不肯正式錄用。這樣的一個人，出入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區當然會引起注意。但是，他需要馬恩列斯毛以外的自由空氣。1984年清明，他騎著自行車，來到了秀水街外交公寓區。我遠遠地迎了出去，再一次告訴他，當局會留下他出入此地的照片。大張微笑，「多一張照片，無所謂了。」進得門來，直奔書櫃。4月25日，二十天前借走的一堆書看完了，他來換書，順便帶走了香港的政論雜誌《七十年代》。我再次提醒他，這些雜誌比尼采「嚴重」得多。他依然微笑，「伸頭一刀，縮頭還是一刀」。之後兩年，我為他和他的朋友們提供了大量台灣、香港的出版品。

最震撼的一幕

陳文泰、劉義方、張明忠等等朋友的命運讓Jeff感覺非常的痛惜。最震撼的一幕卻發生在1985年3月22日，西直門外中關園某宿舍樓一個普通的單元裡。我們去拜訪我高中時期的一位國文老師。席間，老師十分周全地講述了兩個故事。1957年，他的大學同學來到他家，兩位老友喝了幾口酒，這位老同學便對「引蛇出洞」的陽謀發表了一些意見。當天晚上，我的老師便用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了長篇的檢舉報告，第二天一早親自送交黨組織。老同學馬上被打成極右派，送東北勞改，六〇年代初死在勞改農場。講故事的人看到Jeff大為震驚的臉色，更加得意，有聲有色地講述了第二個故事。1967年，文革高潮中，我的老師上台揭發他的親弟弟說過對文革不滿的話，正值武鬥高潮，弟弟當場被批鬥，兩條腿被打成殘廢，弟妹馬上宣布離婚，兩個幼小的孩子受盡欺凌在街頭如同流浪貓一般長大。1975年，弟弟終於獲得平反，卻已經是癌症晚期，不久就過世了。講故事的人心平氣和，講完了，還有點意猶未盡，抿了一口酒，似乎極有滋味。整個的故事會都是我的老師一個人在唱獨角戲，師母一言不發坐在旁邊為他們的兒媳縫一只套袖。對她丈夫所講的故事，她沒有一個字的表示，也沒有任何的表情。偶爾，她抬起頭漠然地望向窗外，眼睛裡的冰寒沉重得瘆人。（轉載自2014.2.5《聯合報》副刊）

(文接一版)

要豐富資源的多元性。那些舊的、糾結不開的新舊文化之爭，應該隨著時代而新陳代謝，重訪的工作則能豐富我們對歷史文化的瞭解，同時也豐富今天的思想資源。

在演講中我也提到，西洋思想史上有過一些類似的例子。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覺得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受到「科學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影響，忽略了古希臘、羅馬文本的許多深義。而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為了瞭解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著作遮蔽的人的複雜性，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去瞭解古希臘羅馬。又如阿道(Pierre Hadot, 1922-2010)的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認為現代人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其實加上太多後代的框架，經過幾度抽離，那些帶有生命實踐的部分被遺忘了。經過阿道的重訪之後，我們更能把握希臘羅馬哲學中精微的複雜性，就像維科擺脫笛卡爾思維的影響，發現了古希臘思想中很多後人感到陌生的資源一樣。又如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迪亞·

森(Amartya Sen, 1933-)的《倫理與經濟》中對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著作中「自利」與「競爭」觀念的探討，發現亞當·斯密對這兩者的主張都是有分寸的。透過阿瑪迪亞·森的重新審視，我們瞭解資本主義原來所聲稱的不是那麼簡單，則我們在考慮人類今天的經濟行為時，便可以有一種新的視野。但究竟如何取捨應用，就不是歷史學者所能全然置喙的了。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究竟解決當今人類困境的資源，只有當今西方的主流思潮，或是可能加上其他的資源？我時常感覺：「近代性」標榜多元化，但近代思想界的情狀卻顯得單元化。這個現象學還原式的「重訪」工作可能開啓了禁錮，顯豁潛流，使我們的思想資源多樣化、豐富化，能得益的不僅只是歷史解釋，它也可能開闢了現實價值的參照資源。那麼我們的價值世界就不再只是單線的、扁平的。

我必須強調，我從未改變我對近代新學術與新思想的前驅的敬意。文化不斷向前發展，新價值不停地創造出來，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在宣

揚簡單的復古。我知道有一種富含政治性的復古思想正在崛起，有很多研究很強烈地希望朝著政治、國族的崛起的方向發展。不過我希望我的演講，不要跟這個趨勢畫上簡單的等號。我一直認為，我所談的這些「重審」的工作有一個前提，即未經過現代學術之洗禮，則所有學問不可能有進境，用王國(1877-1927)的話說：「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國學叢刊》序)，如果不經近代西方之一番震盪，對很多層面是視而不見的，沒有經過西方學說的引會，許多地方不甚清楚，或是雜亂無章，無法很有條理的表述等，不一而足。西方的理論、資源，常常能夠幫助我們好好瞭解古代歷史，而不一定會跟我們「重建」的目標互相排斥。例如李宗同(1895-1975)先生寫了《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還翻譯了《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先不論他說的對不對，但他引用希臘羅馬社會中「家火」的觀念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的確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開啓一個新的面向。如果沒有對古希臘城邦的深入瞭解，他就看不見中國古代史中的那一面。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這本書原本規劃是演講

集，但我一直想把它發展成論文集。然而最後因為時間所限，不能一一寫成論文，所以只能以現在的面目見人。因為是演講集，所以論點比較寬鬆，註腳也做得很少。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加入兩篇文章做為附錄，分別是〈傳統的非傳統性〉(簡體字版《章太炎的思想》之導論)及〈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刊於《古今論衡》第23期)。另外，《上海書評》中有一篇我與葛兆光兄的對話錄(〈尋找「執拗的低音」〉)，亦請讀者參考。

最後，我要感謝一群朋友。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錢雲同學。尤其是葛兆光兄提出了這個邀請，並親自催稿，我要在這裡特別謝謝他。此外，也要感謝復旦大學的章清、周振鶴、陳思和教授在我演講期間為我主持講座，並提供了許多幫助。中研院的蕭高彥教授，林勝影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譚徐鋒先生，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陳昀秀等，以及許多在講座過程中促成、幫忙的朋友，沒有他們，這本演講集是不能成書的。

台灣，打拼

台灣民主化的推手

◎李筱峰



1969年11月，在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後的首屆市議員選舉中，一位年僅29歲的大學畢業的加油站工人，剛剛應徵考上華南銀行的工作卻沒去報到，而投入了這次選舉，很令人意外地在選舉中高票當選！康寧祥這個名字，在此之前，沒有多少人聽過，經此選舉卻一炮而紅，震驚了準備組閣接掌大政的蔣經國，也讓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當局投出訝異

的眼光。一個月後，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這是中國國民黨退入台灣以來的首次中央民代的局部選舉），具有草莽性格、已擔任過兩屆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獲康寧祥的鼎力助選，當選了立法委員。

翌年(1970年)六月，康寧祥以市議員身分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1972年6月蔣經國組閣，台灣政治的新局面開始，美國WTTV的電視記者專程來台採訪，並且特別到市議會採訪新崛起的市議員康寧祥。以一個過去籍籍無名的人物，會在短期間受到國際間的注目，這在台灣政治史上是一個異數。

在野的康寧祥、黃信介的崛起，與在朝的蔣經國的上台，分別為朝野的政治埋下兩條伏筆，為往後的台灣政治，激盪出民主化的局面。

蔣經國組閣的這一年(1972)年底，康寧祥更上一層樓，在台北市參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次高票當選立法委員。這一年，我已負笈台北就讀政治大學教育系，有機會親臨康寧祥的政見發表會，見識到前所未見的萬人空巷的大場面，聆聽他那聲音沙啞卻扣人心弦的演講，那是我這一生中難以忘懷的場景。

我自高中時代起，即因有幸閱讀海光、雷震、羅素(Bertrand Russell)等自由主義著作而大受啟蒙，開始嚮往民主自由的政治。對於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漸生反感。當時在長期軍事戒嚴與所謂「戡亂」體制下，「黨、政、軍、警、特」五位一體，國庫通黨庫，司法、媒體、教育悉由國

民黨掌控，國會由來自中國的老代表充斥，不得定期改選，台灣人只能納稅、當兵。而白色恐怖造成的傷害，更不在話下。對於那樣的法西斯政權，我感到憤懣，但卻又無可奈何！因此，來到台北親臨康寧祥的政見發表會，聽他對時政的諷諷直陳，激昂慷慨，看到成千上萬的選民並肩接踵在熱烈聆聽政見發表會，如大旱之望雲霓，我感到一股希望湧上心頭。記得有一晚的政見會(好像是在萬華車站前廣場)正進行一半，忽然風雨遽起，許多民眾未帶雨傘，卻寸步不離，淋著大雨繼續聽著康寧祥的演說。老康看台下眾人淋雨不散，他立刻請工作人員將台上的遮棚拆開，台上台下大家一起淋雨。康寧祥揮舞著手勢，在風雨中聲嘶力竭地喊著：「今晚的風為咱吹，今晚的雨為咱落，台灣在風雨飄搖之中……咱心連心，手牽手，……」許多人聽得熱淚盈眶，我也聽得分不清在我臉頰上的是雨水還是淚水。感動之餘，我跑去老康的競選總部向他們要了一疊競選傳單，在萬華一帶沿街散發起來，當起助選志工。不嚴格說，我當時應該已算是開始參與「黨外」運動了。沒想到七年後，我擔任了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的執行主編。《八十年代》是1979年下半年與《美麗島》雜誌並肩作戰的「黨外」民主運動的重要刊物。

「黨外」一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一個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而少用「黨外」一詞。自從康寧祥、黃信介崛起後，「黨外」一詞大量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符號。在這個界定含糊、定義籠統卻又簡短的號誌下，一些政治異議人士經由數次的選舉而逐漸凝結成一股在野的政團。「黨外」一詞成為1970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的專有名詞。「黨外」政團也可以說是後來的民主進步黨的前身。

台灣的民主運動，與選舉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一般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中，選舉有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入台以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只是一個「半自治」的型態(地方缺少財政權、人事權、警衛權、教育權)；而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格於所謂「動員戡亂」體

制，完全不讓台灣人民改選，直到1969年之後，經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只改選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即所謂「補選」及「增額選舉」)。所以，台灣儘管有選舉，但並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不過，選舉卻有相當程度的民眾教育作用。尤其在長期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政治下，人民平常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空間，但選舉一到，選舉活動提供在野人士一個「體制內」的發言時段，無形中，為在野反對人士提供一個民主運動的運動場。所以，台灣的民主運動，幾乎伴隨著選舉活動同步進行。而康寧祥無疑是這個運動的重量級領袖人物。

康寧祥從「黨外」運動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到台灣的民主化，幾經曲折坎坷之路，他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當時許多國內外政治觀察家認為，有朝一日康寧祥可以成為台灣的政治領導人。但是風雲際會的結果，後來居上的陳水扁成為總統，而康寧祥反而屈居其下。然而從歷史的觀點看，康寧祥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絕對不在陳水扁之下。

我在大學研究所開有一門「台灣民主運動史」的課程，我以一位研究者，也是參與者的身份，告訴學生說，從1970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到90年代的「民主化」，康寧祥的角色如果去除，這部民主運動史一定殘缺不全。

很高興看到康寧祥先生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這位昔日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推手，將為台灣的民主運動史、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留下珍貴的見證。

史家知道，要研究二次大戰的歷史，不能不看蒙哥馬利的回憶錄，以及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要了解俄國革命及俄共內部政治鬥爭的歷史，就不能不看托洛斯基的回憶錄《我的一生》；要了解印度早期的民族獨立運動，就不能不看甘地的《我的真理實驗錄》，以及尼赫魯的《自傳》；即使像政治上並無顯要地位的猶太裔俄國作家約倫堡，他的一部篇幅浩大的回憶錄《人間、歲月、生活》，也被譽為是一部「蘇聯知識份子的精神史」。同樣的，我可以大膽地說，要瞭解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要瞭解台灣的政治變遷，就不能不看康寧祥這部回憶錄。

靈機一動

◎林天送

一百年來我們看到許多驚人的科技進展，也會驚嘆發明與發現的奇妙。其實人類一直在追求能克服大自然的工具有，常常想用各種發明來改善我們的物質生活，以期能過著更方便、舒服而有趣的生活。但人類是千萬年演化過來的動物，在逐步演進的過程中去適應新的生活環境，許多發明與發現只不過是演進過程中的一個步驟而已。

本書收集了為期三年(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在《科學發展月刊》(國科會刊物)發表過的三十六篇專欄報導：「突破的故事——靈機一動的思維」。另外也附加曾經在同一刊物發表過的二篇報導：「環境荷爾蒙——從限制使用塑膠袋說起」(2003年10月)和「自由基化學與醫學」(2008年12月)。撰寫本書的原動力是想藉由這三十六個突破的發明故事喚起大眾對科學與工程的興趣與熱忱，鼓勵學生們能以謹慎和嚴密的態度去從事基

礎研究，繼而期望能更上一層樓，入發明的樓閣，造福人類。

學習、參閱許多科技發現與發明史，我們發現許多發明是來自「靈機一動」的突破思維，這些突破的研究常帶來創新的工具、方法、理論、醫療等，也促進了人類的福祉。但發明者當初的用意可能僅在於改善當時當地的某一項日常生活細節，後來有人把這發明應用到新的領域，達成了新的功能，這就變成一種新科技，也就改變了人類的許多生活方式。譬如當初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發明蒸氣引擎，僅是想用機械功能來代替來人工及馬車，但最後被應用到火車、汽車、飛機、潛水艇等，引起工業大革命，影響了整個人類的社會形態。再說約翰·巴帝恩(John Bardeen, 1908-1991)得過二次諾貝爾物理獎，1956年因發明半導體晶體管(transistor, 見第十四和十五章)得獎，1972年因超導體的獨特理論得獎，當初發明半導體晶體管是想取代笨重、佔空間而功能低的真空管，但後來由電子裝備而電腦、太空、國際貿易等都是依賴這項發明。再來看許多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研究，當初可能僅是為了滿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或僅是單純的基礎學術研究，基礎學術研究是指沒有特定應用的研究，譬如雷射(laser)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物理系教授查利·唐恩斯(Charles H. Townes, 1915出生，今年98歲)發明，當初的研究是探討有關微波的激光量子現象(maser: microwave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微波與我們看得到的光都是電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他因這項研究獲一九六四年諾貝爾物理獎，由maser到laser，而擴大應用到光的指標、CD、DVD、貨物條碼辨識器、基因分析等(見第十七章)。這些發明的應用皆大大地出乎發明者的原先用意，達成意想不到的應用而變成新的科技潮流，讓後人享受到這些發明的成果。

本書將報導一些近代科技的進展小故事，用

科學家與發明家的思考做背景，來了解發明某項科技的前因後果及過程，我們先看電話發明的故事：阿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 1847-1922)，1876年3月9日在他的實驗簿記載這項新發明而得專利(見第三十三章)，雖然這之前，貝爾一直在思考電話的發明，但那天的實驗並不是要發明電話，他與助理湯瑪斯·華生(Thomas A. Watson)是想改進電報的傳遞問題，想利用諧波(harmonic wave)方法一次同時傳遞多項電報，但無意中卻發現他們的裝置能傳遞聲音，使得貝爾喜出望外，後來才有行動電話的發明，縮短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與隔閡。如果你失去電話的方便，你會有多大的不便呢？後來有貝爾電話公司及貝爾研究實驗室(Bell Laboratory)的建立，貝爾研究實驗室曾經是美國規模最大、最有名氣的民營實驗室，這實驗室開發出無數的發明，貝爾實驗室也曾經培養出六位諾貝爾獎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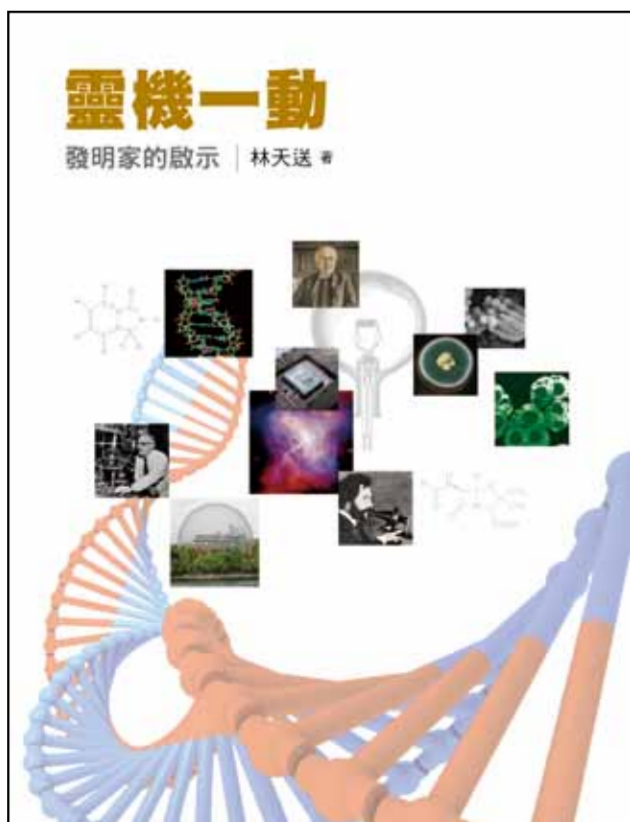
發明家的座右銘——需要是發明之母，其實仔細去翻閱科技的發明進展史，我們發現大多數的發明都是因「需要所使」(need driven)而得來的，如愛迪生(Thomas Edison)尋找電燈泡燈絲是個典型故事(見第十九章)。另外還有三個推動發明的因素：(一)數據所使(data driven)，用類推法去發現許多奇妙的可能性，如唐恩斯的微波實驗，由maser類推到laser的方法(見第十七章)；(二)方法所使(method driven)，用儀器去觀察、發現與發明，如天文學家彭齊亞斯(Arno Penzias)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測量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信號，創立新的宇宙觀，獲一九七八年諾貝爾物理獎(見第三十一章)；(三)理論所使(theory driven)，憑自己的心得及理論根據去推理而得到答案，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

翻閱許多發明家的身世及科技的發明進展史，我們也發現：發明家的特色是有好奇的思維、不輕易放棄的精神、能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去創新。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擁有1098項專利)的一句名言是：「發明是一分靈感，九十九分努力(流汗)」。就像愛迪生與助理花了二年的時間，試了一千多種不同材料來做電燈泡的燈絲，但都不

盡理想，最後才找到碳絲做燈絲而申請到專利。愛迪生能確認電燈泡的重要性，有「需要所策」的動力，加上他的好奇心及不輕易放棄的精神，才使他找到答案——碳絲，這也說明愛迪生一生能擁有約將近一千一百項美國專利的一個原因。他還曾經說：「我曾經試了一千多種材料來做燈絲，但我從未失敗，因為這些實驗告訴我有一千多種材料不是做燈絲的材料。」

我們也發現：許多發明家並沒有具備高等教育或學歷，而許多突破的發現與發明關鍵是發生在「靈機一動」的刹那，好像「發明之神」特別眷顧他們，讓他們撿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體驗到發明者的最高境界：「我找到了！」或「阿哈」的興奮與感嘆。但即使有些發明是「偶然」發生的，當事者必須有準備的心，能「識寶」而方能抓住機會進一步求精、開發出新科技，正如著名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說的：「機會眷顧有準備心的人」。例如微波爐的發明者史班賽(Percy Spencer, 見第三章)，雖然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但他有好奇及好學的精神，跟人家做了二年電氣學徒，就變成無所不通的電氣修理員，十八歲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入美國海軍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工程。一九四五年的一個夏日午後，史班賽在測驗高能量磁控電子管後，注意到口袋的巧克力糖熔糊掉了，這意外使他聯想到利用磁控電子管來做加熱工具，進一步的許多實驗後證實他的推想，而才提出微波爐的專利申請。

著者曾經有二項研究申請到專利：(一) Electrolytic Coatings of Polymeric Film on Metals (R. J. Ehrig and T.-S. Lin), US Patent #3,464,849 (Sept. 2, 1969), 及(二) Method for Treating Neuronal Injury with Carboxyfullerenes (D.W. Choi, L.L. Dugan, T.-S. Lin, and T.-Y. Luh), USA Patent #6,265,443 (July, 2001)。但可惜還沒有被普遍採用。雖然第二件專利的論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彙刊》Proc. Natl. Acad. Sci., 94, 9434-9439 (1997)，而有高達五百七十次citations。但我也體驗到發明者的興奮與期待。



邊境發表會

日期：2014年2月7日

地點：2014國際書展·世貿一館·藍沙龍

記錄：謝珮怡

楊澤：其實我只是來串場。我跟大家一樣，對這本書講的東西感到新奇，非常的有意思，可能跟大家一樣沒有去過喬治亞或者是亞美尼亞。我可以問一下大家嗎？有誰去過那個地區？有沒有人去過喬治亞或土耳其？土耳其，有。東歐或波蘭，有人去過嗎？好的，我們的這個作家他是波蘭人，我想也許大家已經對這本書有一點瞭解，但我還是先講幾句。這個書原來中文名字應該是《向祖先致敬》，但是改成《邊境》好像是更恰當，因為這裡面講了好多種邊境，有政治的、有文化的、有宗教的，錯綜複雜。我要很鄭重推薦這本書，因為可以對我們台灣自己的處境有一個座標、有一個對照的作用。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很短，我想我們現在就先歡迎古瑞茨基先生。

古瑞茨基：午安，我親愛的朋友們，謝謝你們來。我在這裡出版了我的書《向祖先致敬》，和中文的書名《邊境》不一樣。這本書是南高加索系列，之前已經寫了北高加索，有車臣那些國家。這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處理喬治亞、亞美尼亞跟亞賽拜然。

我處理高加索的課題已經有二十年了，高加索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不論在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經濟上，在一個很小的地區，大概就等於中國河北省這麼大的地區，充滿了很錯綜複雜的關係與鬥爭。

我到高加索是以不同的身分去，以記者的身分、學生的身分、學者的身分。包括從學生到記者到學者到外交官，我在亞賽拜然首都巴庫住過五年，從2002年到2007年，我住在亞賽拜然的首都巴庫，是以外交官的身分。

我要向大家解釋，為什麼這本書的書名原來是《向祖先致敬》，然後中文改成《邊境》。我同意更改書名，從《向祖先致敬》改成《邊境》，因為高加索本身就是一個很龐大的邊界，有非常多的邊界在這個版圖裡。高加索它同時介於歐洲跟亞洲之間、西方與東方之間。高加索同時也是介於基督教世界與回教世界，既如回教介於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也同時是山與海，以及山與草原的邊界。跟台灣很像，也是介於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或許從這一點來說，這本書會讓台灣的讀者感興趣。

我的書最重要的是我對人的想法、人的思考方式，還有人的行為感到興趣，我試著透過高加索的歷史以及個人的歷史來講述它的故事。我的書是非虛構文學，屬於紀實文學，為什麼我選擇以非虛構而又紀實的方式來寫作這本書？我認為紀實比虛構有趣，我認為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事實、真實。在波蘭，我們有很長遠的紀實文學傳統，我們在波蘭有一個文學報導的傳統，報導是因為紀實。何謂報導文學？是因為我們用文學的方法去敘述、報導真實的事情。

波蘭最重要的紀實文學作家是卡普欵斯基，他七年前過世，他是1950年到1990年代衝突的見證者。卡普欵斯基的書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版，也同時

在台灣出版。（尉任之問：台灣是允晨文化出的嗎？是，《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也是由允晨出版）我感到非常榮幸，跟他在台灣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我的著作。

首先要感謝波蘭駐台北代表處，感謝波蘭代表處在台灣幾位同事。謝謝謝廖志峰，我的出版人，很高興認識他，以及非常感謝我的譯者粘肖晶小姐。感謝波蘭出版協會的引薦，才能在台灣出版。

尉任之：我覺得大家可以有很多問題向他提出來，因為高加索對台灣來說的確是一個很陌生的地方，講起來好像大家都知道高加索在某一個地方，其實高加索就在俄羅斯的南邊，黑海以東，裏海以西的三個小國。它的確以台灣來說是很遠，我想從台灣去這三個地方都非常不容易，不然就是要到中國大陸某些城市轉機，不然就是到歐洲去轉，那我個人可能因為畫展的緣故，我去過喬治亞大概四、五次，亞賽拜然、亞美尼亞。的確是一個讓我本人感到又陌生、又遙遠，但是又很親切的國家，因為他們的情風俗其實跟台灣人很接近，很熱情，也很敏感。今天很高興大家來跟他分享，也希望大家能提出問題，讓他能為我們做更多的回答。

楊澤：我們要請他先唸一下他的詩？因為我們前面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剛剛其實在這個會開始之前，他提到他年輕的時候去高加索寫的詩。

尉任之：這個要請波蘭代表處的維德翻譯。

楊澤：對不起，我跟尉任之聽錯了。因為俄國文學裡面講高加索，從普希金到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到托爾斯泰都有很多詩，那年輕的時候很嚮往高加索，所以他讀了他們的詩。

尉任之：我自己有一個問題，因為剛才聊天的時候他講到的，但沒有說出來。我個人去高加索，我覺得高加索是一個很讓人墜入情網的地方，各種層面來說。所以我相信他去高加索一定也有很多經驗，所以我希望他跟我們講這個。

古瑞茨基：大概三十年前吧，我還是學生的時候，1980年代初期，我讀到了托爾斯泰寫高加索的小說（尉任之：可能就是以前志文出版社的高加索故事那一本）。我講的那篇小說，中文翻成「高加索的囚犯」，是托爾斯泰的一個短篇小說，我讀到在帝俄時期，在高加索戰爭時，三個俄國人被俘虜，關在高加索山裡。有一部電影，1996年的一部電影《山中的囚犯》，就是這個小說改編的。我讀這個小說的時候就開始想像，非常美妙的小說，想像在山裡頭、在村莊裡頭，它那個小說的背景是北高加索山麓（尉任之：這是我補充的），想像那個山、那個山村。

我讀到這個小說十年以後，大概是1990年代初期，蘇聯已經解體以後，那個時候正好是喬治亞很亂的時候，第一任總統，書裡頭也有寫到，加姆薩胡爾季阿，原名叫做「*ზვიად გამსახურდია*」的最後一個星期，然後到謝瓦納茲上台的第一個星期，這期，喬治亞非常混亂，我治亞旅行，高加索旅行。任之：我補充一句，那時候的喬治亞，你進去旅大門有一個警察崗哨，先把步槍放在警察台上面去。）

我是以記者身分去的，不同的波蘭報紙做報導，快就發現這個地方是有很多的故事要講的地方，必須很多故事來寫這個地方，所定寫書。後來對高加索的越來越認真，現在任職於華沙雷克·卡爾普東方研究中我的三部曲已經完成現在這個《邊境》是第三部的第二部，希望志峰把第三部也都出齊。



高加索、北高加索，構成一個很漂亮的天環境，就是山、有水、有河、有森林，包括有一些草原等等等等。那個地方是很美麗的，但是不是美麗的宿命，這個存疑，是宿命的。

楊澤：有沒有朋友還有問題？

讀者二：請問一下，原來您想的是《向祖先致敬》嘛，那因為您是從波蘭過來，您認為高加索跟波蘭之間有什麼關係，讓您覺得要用向您的祖先致敬的方式來作為這本書的標題？當然這個地方它是一個非常多種族的國家，所以您可以接受把它改為《邊境》，但是我想說波蘭跟高加索之間，它們是怎麼樣的關係，讓您覺得說要向祖先致敬，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您書裡的意境？

古瑞茨基：我很喜歡這個題目《向祖先致敬》，現在我要跟您解釋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題目。首先在高加索這個地區，包括三個國家，過去是非常重要的，過去甚至比現在更重要。祖先非常重要，在高加索，祖父甚至比孩子更重要，因為這就是傳統，他們的傳統。其中的一個意思是，在這個地區，過去是非常重要的，有這個含意，用本來這個題目。第二層的意義或許更直接，在高加索，特別是在喬治亞，他們向祖先致敬，（尉任之補充：這個跟他們的餐桌文化非常有關係。）對我來說，是我想我的祖父母致敬。在波蘭當然過去很重要，但是在喬治亞，就是高加索，過去又更重要，他們的土地、他們的祖先、他們的來源。

尉任之：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我的旅行經驗中，看過一個地方，對自己的出生源頭這麼注重，所以在喬治亞你看，每個人都是什麼王子、公主，都是這一類的。

古瑞茨基：亞美尼亞官方的外交部網站，他們講他們自己是以三千年的歷史來講，那個大亞美尼亞的時代。亞美尼亞會講一個地方，可能這個地方三千年屬於他們，所以他們認為他們對這個地方是有權力的。

尉任之：其實某方面來說，跟以色列人對耶路撒冷這個應許之地有點像。

楊澤：等一下我們可以問他，他另外兩本書的題目。他的作品核心除了東方、西方，伊斯蘭跟基督教，中心跟邊緣以外，其實作品後面有一個好像很深層的，我們現在可能沒有時間了，就是說國家這個東西，是在啟蒙跟浪漫派的，一個代表普世價值，一個代表特殊價值，這中間的衝突。我們希望民族國家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可是事實上這中間有很大的衝突，就整個現代國家的形成，在這個底層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張力在，所以他說他把這個書獻給他的祖父母、獻給他的祖先，應該是一樣是小國家的波蘭小國家然後去看高加索這些小國家，他會看到自己。所以你的問題其實沒有問題，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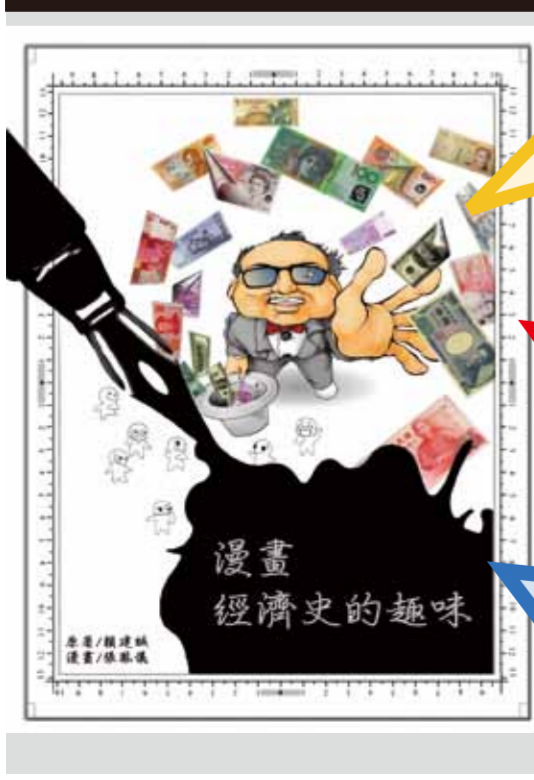
尉任之：其實波蘭的版圖移動也很大對不對？

楊澤：你可以告訴我們另外兩本書嗎？

古瑞茨基：第一個叫做《高加索星球》，是一個碎裂的星球；第二個是《邊境》，這都是講比較大的關係，第三部書是寫阿布拉哈茲，就是喬治亞靠近黑海的一個分離出去的小共和國，以前是喬治亞人度假的地方，很小，只有八千平方公里，非常非常小。俄國介入很多，我用深入的寫法去寫阿布拉哈茲，就是這個分離出去的地方，這是我的第三本書。我想用一個很對位的方法，前兩本是比較綜觀的，第三本是比較深入的。

楊澤：時間已經到了，不好意思，我們再一次謝謝古瑞茨基先生。

漫畫經濟史的趣味出版囉



為什麼電腦鍵盤不依ABCD排列？回想以前初學電腦時，總是低著頭用一手指功努力的在鍵盤上找找，忙得滿頭汗還打不了幾個字……究竟！這個不人性化的鍵盤按鍵，到底是怎麼設計出來的呢？

環境與身高 19世紀時，擁有世界霸權的歐洲成年軍人，身高竟然不足170cm？「地靈人傑」這句話，究竟是迷信，還是確有其事？

有用的戰爭 1945年，慘烈的世界大戰落幕；滿目瘡痍的戰敗國日本，竟能一躍成為世界強國！……其中一個重大關鍵，竟然是「戰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